



元朝疆域辽阔，定都燕京，称作大都，北京由此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。郭守敬主持开凿京杭大运河，又将北京原有的水系通过通惠河在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，漕船带着江南经济中心的物产，可直接驶入积水潭码头。大都城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兼容并包的繁华都会。

明清时期，京杭大运河进入兴盛发展阶段。大运河上不仅有运送粮食的漕船，还有各类政务用船、民间商船和使节用船，丝绸、茶叶、砖木等物资依赖大运河千里通波，使北京城拔地而起并顺利“转型”。当时作为漕运中心的通州也因此有了万舟骈集、舳舻蔽水的独特景观。

可以说，元明清三代大运河都是帝国京城运转的生命线。

“元朝定都北京之后，一开始是粮食量有所增长，从原先的100多万石，到后来每年三四百万石的漕粮沿大运河运往北京。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研究所副所长高福美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有个很有意思的转变，“到了明清时期，运河上民生日用品的量其实是多于漕粮的”。

高福美介绍，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，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，即地方特产随船发卖。据清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的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，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艘，携带茶叶、白糖、纸张、槟榔、白蜡、桐油、姜黄、鱼胶等商品数十种。此外有来自东北、西南、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到京城，并纷纷在附近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。

“明代，运河终点码头由城内的积水潭改到大通桥附近。土宜相当于‘免税商品’，不需要交税。但当时其他外地商旅经运河进京，都要经由崇文门税关进城。”高福美表示，因此大运河还见证了我国税收制度的变迁。随着官商客旅频繁往来、商品交流范围扩大，崇文门税关的税收持续增加，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，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与此同时，士人、商人、民间艺人等人员都倚赖着大运河入京，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加速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，使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。而藩属国与外国使节、传教士等，同样沿